

辞书研究

3

1981

C
I
S
H
U
Y
A
N
J
I

辞书研究

1981 年第三期

(总第九期)

·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编纂的理论与实践·

- | | | |
|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 | 刘庆隆 | 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编写工作二十年 |
| 20 | 闵家骥 | 略谈收词 |
| 30 | 孙德宣 | 论释义的科学性 |
| 42 | 韩敬体 | 同义词语及其注释 |
| 54 | 柯琦 | 科技词条的处理 |
| 63 | 曲翰章 | 字、词与连写 |
| 70 | 李实 | 关于资料 |

- | | | |
|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79 | 张志毅 | 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释义的语文性 |
|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
-
- | | | |
|----|-----|-----------|
| 86 | 符淮青 | 义项的性质和分合 |
| 95 | 邹 鄯 | 语文字典的义项排列 |

-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|
| 120 | 陆锡兴 | 通假字管见 |
|-----|-----|-------|

-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105 | 王自强 | 试谈辞书的文风 |
| 113 | 黄筠 | 索引简论 |
-

· 辞书杂谈 ·

- 126 彦 和 漫谈过了时的语词
128 林 衡 “明日黄花”
129 杨 村 说“爻”
130 林 帆 “鸿门宴”小议
131 马君骅 “康庄”“权衡”辨源
133 于家齐 略语表应力求统一

- 135 刘正埏 《汉语外来词辞典》序言
140 柯 仪 一本创新的语文词典
——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
147 马锡鉴 陈增杰 台湾省编《成语典》琐议
153 魏治臻 评介蒙英日、藏英辞典
157 李成林 《测绘词典》介绍
161 吴 莹^{节译} 评《朗门词典》的释义
165 林海鑫 浏览美国《哲学百科全书》
172 姜其煌 欧美百科全书中的《红楼梦》(辞书文摘)
179 常 政 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编辑史话(中)
189 杨业治 西德辞书的编纂和出版
198 陆 婷^{节译} 电子计算机和古西班牙语词典

- 208 萧家成 双语对释语文词典的特点和方法
217 但汉源 英汉词典的修订

· 辞书释义探讨 ·

- 264 朱声琦 释“为寿”
257 刘伊言^{节译} 选用辞书的窍门

222	洪笃仁	《说文解字》的作者许慎
239	黄建华	坚毅顽强的实践家 ——法国词典大师利特雷小传
251	邓啸林	鲁迅先生和词典
255	沈国祥	辞书收藏家波恩二三事
· 辞书资料 ·		
279	方厚枢	建国三十年来出版辞书编目(续完)
283	塔伊尔江等	——少数民族语言词典部分补遗
269	潘树广	词典学论文索引补编
辞 书 之 窗	《简明同义词典》即将出版(53) 日本的《草书大字典》(62) 《中国艺术家辞典》将分册出版(85) 日本1981年版《每日年鉴》发行(119) 三本小学工具书即将出版(152) 《专门家事典, 中国文学》在日本出版(164) 《说文解字约注》影印本年内出版(164) 台湾省出版《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》(178) 中法合编《法英汉农业词典》等工具书(216) 北美词典学会年会消息(221) 日本出版《汉诗名句辞典》(238) 《小拉鲁斯词典》1981年版问世(250) 美国报导《辞书研究》(286)	
268	答读者问	补白 读者·作者·编者

辞书研究

第三期

1981年8月

编辑者: 辞书研究编辑部
上海陕西北路457号

印刷者: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

出版者: 上海辞书出版社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上海市期刊登记证第29号

书号 17187·61

每册定价 0.75元

现代汉语词典

编纂的理论与实践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编写工作二十年

刘
庆
隆

自从1956年开始准备编写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到1978年正式出版，前后经过了二十二年。在这段漫长的工作中，从我个人来说，经验没什么，教训却不少。以下几个问题对做词典工作的同志或许有可借鉴的地方，简单地谈谈个人的看法，供参考。

一、明确编写宗旨

使用词典的人大都希望词典无所不包，查什么有什么。但一般词典篇幅有限，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需要查考的问题，而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。一部词典能把它所要解决的那部分问题解决好，就应该说是一部好词典了。一部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词典是编写不出来的，即使能编写出这样一部词典，篇幅也会大得不得了，使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，更不可能每个人都买一部放在手头。所以，编写一部词典，首先要明

确供什么人使用,解决什么问题,宗旨定了,才好进行其他工作。各人对词典的要求是不尽相同的,就是参加编写工作的人,看法也会有差异。编写宗旨确定了;没有什么大不妥,就要进行下去,不要轻易变动。否则,筑室道谋,三年无成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编写宗旨是十分明确的,1956年2月6日,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,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。也就是说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是为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服务的。这个大的方针是不能改变的,要努力使这部词典更好地体现这个方针。我们的工作也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。总方针虽然明确了,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还是走了不少弯路,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。

比如关于是否收录古汉语词汇和生僻字问题,最初讨论编写方针时就有不同意见,有的主张收录一部分,以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有的为限,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有的就收,没有的就不收。经过反复讨论,最后决定不收现代汉语中一般不使用的古汉语词汇。正文中也不收现代汉语中不使用的生僻字,为了备查,在附录里酌收一部分,就是《试印本》的样子。

开始编写时就是照这个原则进行的。后来为了备查,收了一些古汉语词汇和生僻字。收录这些古汉语词汇和生僻字,没有范围,也没有标准,信手拈来,很不一致。另一方面,这些词汇和生僻字收的是古汉语的意义和用法,而现代汉语词汇有的也有古汉语的意义和用法的,却没有收,就显得很不协调。

本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是以确定普通话词汇规范为目的的,普通话中不用的古汉语词汇和生僻字,是可以不收的。为了备查,收一部分,实际上解决不了阅读古汉语著作的问题。原因是这类字、词数量非常的大,星星点点地收一点儿,大量的还是查不到,而且收的这一点儿还未必就是常要查的。

常听到说“词典是备查考的”,这句话无疑是对的。但所谓“备考”,也只能是就词典所要解决的那一部分问题,增加一些条目

以备查考。比如《现汉》是收录普通话词汇的，应把普通话词汇多收录一些备查；不能把古汉语词汇或其他方面的内容收的更多些，因为即使再多些，也代替不了古汉语词典或者别的词典。反而占了篇幅，挤掉了普通话条目。

二、制定编写细则

一部词典虽然是由若干不相统属的条目组成的，看起来系统性不强，但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不是一个拼盘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个严密的系统把全部条目联系起来。这个系统就是根据编写宗旨制定的词典体例，对编写人员来说就是编写细则。有这样一个细则是十分必要的。就是一个人单独编写，有这样一个细则也便于前后一致，整齐划一。对集体编写来说，更是大家共同遵循的准则。这就好比是制造一台机器的蓝图。有了蓝图，每个人都严格按照蓝图制造零部件，把零部件组装起来，就能制成一台所要求的机器。如果每个人不按照蓝图，随意制造零部件，这些零部件是组装不成所要求的机器的。

编写细则根据编写宗旨制定，在各方面都要体现宗旨的精神，尤其是在收词、注音、释义、举例几个重要方面的规定，更要鲜明地反映出编写宗旨的精神。

编写细则要尽可能定得详细具体，不但主要方面要有详细的规定，就是一些符号，包括标点符号的使用，也都要规定好。每项规定都要举些典型的例子，通过例子使编写人员更好地领会规定的精神。当然，有些规定难以定得太具体，比如收词一项，就只好定得太死。但也不能伸缩性太大；伸缩性太大了，不好掌握，很可能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结果成了无章可循。

编写细则要定得适用，不能提出过高要求，否则就会成为一纸空文。为了定好细则，要先制定草案，通过试编，认真讨论，集思广益，反复实践，逐步充实完备，最后定下来执行。在正式编写中，可能有个别规定不大适用，还需要改动。因为制定细则比较慎重，改

动的地方不会太多。凡能不改动的，尽可能不轻易改动。因为每改动一次，就要返一次工；就是改变一个符号，也要把编写好的稿片翻一遍，还可能改之不尽，造成不一致。《现汉》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，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，也没有做好，真是得不偿失。比如“也作×”，先是用“也作×”，后改为“也写作×”，最后又改为“也作×”。这种无关紧要的细节，却花了很大的代价。

三、做好准备工作

编写词典，工作量大，为了争取时间，往往工作一开始就忙着动手编写，其结果，由于基础没有打好，欲速不达，造成返工，挫伤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，还得回头补做准备工作，延误了时间。各项准备工作做得好，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，编写工作就会进行得比较顺利，结果可能缩短编写时间。

准备工作包括明确编写宗旨、制定编写细则、试编、收集资料等方面，其中收集资料是很重要的一环。资料是编写的基础，做好收集资料工作就给编写工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。资料工作做得不好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很难编写出有水平的词典。编写中最头疼的事，就是苦于资料不足，难下定断。

收集资料工作很不简单，要脚踏实地地去做，一点也不能取巧，不花很大力气是做不好的。不会做资料工作的人，编写不好词典。只有熟悉词典业务，又肯埋头苦干的人，才能做好资料收集工作，选取的资料才比较合用。

《现汉》编写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：先是研究了国内外一些有代表性的词典和有关词典编写的文章，编写了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，从选词、注音、释义、排列等方面做了一些研究，制定了一些原则。

工作正式开始前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，包括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和工作人员的多次讨论会，访问了专家，发表了试编样

稿,广泛征求意见。在这个基础上,指定专人根据编写宗旨制定编写细则。组织人力依照细则试编。通过试编,多次修定编写细则,最后确定下来。

正式编写前,组织了力量,根据词典的要求,开展了收集资料工作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,收集资料卡片约七十万张,连同原新华辞书社的卡片,共约一百万张。

由于时间紧,当时认为准备工作差不多了,资料虽然比设想的少(原设想收集五百万张卡片),也可以勉强对付了。现在看来,准备工作如能做得更细致些,后来的返工会少些。这主要是对试编条目的讨论和总结工作做得不够,使一些分歧没有能够及早得到解决。当然有的返工是难免的,总有一些事先考虑不周的问题。

后来编写时感到资料是很不够的,无论是从数量或质量来说,都满足不了工作的要求。有些很常用的词汇或用法没有资料,结果词典里就漏收了。有些词汇资料太少,对意义和用法不能进行很好的分析。有的词汇的资料,不必要的重复太多,浪费排比分析的时间。如果资料工作做得更好些,肯定编写的质量会更高些。

四、分工负责,照顾全局

词典涉及的方面很多,一个人精力有限,难以做好。部头大些的词典需要集体来编写,才能众志成城,集思广益,编写出比较好的词典。集体编写词典比集体编写一般的书要难,因为一般的书连续性、整体性强,分章分段写,比较容易写得一致。词典比较零散,比较庞杂,不论是分段编写,还是分科或分类编写,不容易一致,前后常常照顾不周,自相矛盾。就是细则中的规定,执行起来也屡屡发生分歧,认识不同,标准不一。而且有些规定,确实也不好掌握,比如选词的宽严,释义的详略,不大容易划一。但一部词典绝不是拼盘,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。这就要求参加编写工作的人员注意全书的一致性,严格遵照编写细则的规定,照顾全局。从自己担负的工作来看,可以这样处理,但从全书来看,不能

这样处理的，坚决不这么办。从自己担负的工作来看，这么做有困难，但从全书来看，需要这么做的，一定要这么做。这才能保证全书的一致性。

集体编写词典要有明确的分工，每个人要尽力把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做好，使它符合词典的要求。凡不符合要求的，应由自己返工，直到做好为止。前边人的工作要为后边人着想，不要给后边的工作遗留问题。自己负责的工作，自己熟悉，处理起来比较省事，也容易划一。留给后来的人，别人不熟悉，就费事多了。

根据词典的要求，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工。编写的分工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：时间紧的，可以分段编写，便于齐头并进，流水作业；时间允许的，可以分类编写，便于前后照应，内容划一。虽然有分工，还要彼此照顾。方法可以采取及时联系，共同解决，也可以采取写通知单，将联系事项，转给有关的人处理。

集体工作中，常会有不同的意见，尤其是学术问题，见解不同，更是常事。不同的意见要进行讨论，工作讨论会上要充分发扬民主，让大家尽量发表个人的意见，开展百家争鸣。经过充分讨论，决定下来的事项就要共同遵守，不能各行其是。不同意见可以保留，继续探讨，学术问题，可以研究，也可以发表文章，但不能把这些不同意见带到工作中来。

我们平常习惯个人写东西，不大习惯集体写书。个人写，照自己的意见写就行了，不必和别人商量。集体编写，就得彼此照顾，尊重别人的意见。如果都强调个人的意见，不照顾全局，不遵守共同制定的原则，词典是编不好的。

五、主编负责和群众路线

集体工作既要有坚强的领导，又要依靠群众。只有领导，而没有群众的积极性，就会形成领导的空忙，做不出成绩。没有领导，群龙无首，一盘散沙，也不会做出成绩。词典编写也不例外，既要有主编来主持工作，又要依靠群众，共同完成任务。

一部词典的主编是这部词典工作的主要的业务领导，要总揽全局，掌握编写宗旨，协调各部分的工作。对词典中的重大问题能拿出自己的意见，对词典中的学术问题有自己的见解，对群众中的不同意见能进行仲裁。主编的主要工作是对整个词典工作的领导，而不只是看稿、定稿。尤其是大、中型词典，字数较多，主编看全部稿子，最后还要把全部稿子定稿，这是有困难的。主编只能看有代表性的条目，审定疑难条目，集中精力解决关键性问题，突破一点，推动全局。主编既不要包办看稿、定稿，也不要脱离看稿、定稿工作。包办了，看不过来，会影响整个工作的进程。脱离了，摸不准词典中的关键性问题，难以提高词典的质量。

《现汉》编写工作中，“瓶口细”一直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，大家对这个问题意见不少。所谓“瓶口细”，就是全部稿子都要通过主编定稿，几十人编的稿子都拥到这里过不去。主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别人又觉着有力气使不上。为了解决这问题，《试印本》最后由四个人分段定稿，《试用本》由一个小组定稿。即使这样，定稿工作仍然是最忙的。

词典编写工作既然是主编负责，参加工作的人员应该服从主编的领导，执行主编的决定，尊重主编的意见。主编也要相信群众，虚心地倾听群众的意见，尤其是一些不一致的意见，更应该慎重对待。这样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，同心同德，群策群力，把词典工作做好。

主编的意见和工作人员的意见不一致时，不宜简单地做决定，原则问题，应进行充分讨论，最后做出决定，实在无法一致的问题，应以主编的意见为主。非原则问题，也要说清楚为什么这么做，以便工作人员好去照着做，这实际上也是对工作人员的培养。主编对待不同的意见，原则问题要坚持，可此可彼的问题，不一定都强调自己的意见，能按照别人办的，可以按照别人的意见办。主编的意见，不管是业务问题，还是学术问题，要为群众所理解，否则，大家只是跟着干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工作是做不好的，也无法

发挥大家的创造性。

“文人相轻”的旧习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，强调自己的意见，看不起别人的意见，互不尊重，时有发生。处理不好，常常在稿子上形成“拉锯战”，改过来，改过去，抵消力量。严重的，甚至闹对立，争最后看稿，以便把自己的意见做为定稿意见，使词典反映自己的观点。要尽力避免这些情况。

词典涉及的面非常广泛，《现汉》虽然只是一部中型的语文性词典，收了五万多条词汇，但从《试用本》所标的科目来看，就有四十多个学科，实际上还不止这些学科，而是涉及到各行各业。一个人不管学识怎样渊博，也难以把各方面都包下来，只能依靠大家，分工负责，分口把关。

六、内部审读和征求意见

词典内容广泛，涉及各行各业，编写人员，虽非一人，但总的说来，人数还是很少的，而且知识有限，不可能面面俱到，样样都懂，须要广泛地征求意见，消灭错误，提高质量。过目的人越多，发现的问题也会越多，错误就会越少。《现汉》油印了三次，铅印了三次，其中部分难处理的条目，还另外油印了三次，铅印了三次，分送有关方面，广泛征求意见。编写初稿时，就约请了所内外十几位专家，组成审订委员会审订全部稿子；组织所内其他组室的同志进行全面的或分段、分项的审查。同时把油印和铅印的稿子剪贴成卡片，分门别类地送请有关单位和全国一百四十多所大中学校去审查。部分条目送给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去审查。一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麻烦了好几百个单位，还麻烦了许多专家和读者。如果说《现汉》取得了一些成绩，这也都是大家的努力和各方面的帮助。

在组织外力审查时，编辑室内也组织了部分参加编写工作的人员进行审读。室内同志由于业务熟悉，了解词典的要求，对编写中的问题看出来的比较多，提出的处理意见也比较中肯。但涉及专业知识方面的问题，相对来说，发现的比较少。

《现汉》多次油印、铅印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有可取的一面，也存在着不少问题，即花费的人力、物力和时间太多。而且，表面上看来组织的人很多，实际上并不能发挥所有人的力量：有的不了解词典工作，不知道从那里提意见，要提一些什么问题；有的虽然能看出问题，但由于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来做；有的是应付故事。在这些方面，难免只是形式。不如有针对性地约请一些人来进行审查，工作会做得更扎实些。

组织外力审查，送审的条目不宜太多，凡自己能解决的不必送出去，只把自己定不下来的条目，送去审查，请他们协助解决提出的问题。条目多了，工作量太大，一般的专家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审查，就是勉强看了，工作也不大可能过细。当然，有的专家或单位愿意多承担工作，请他们帮助多审查一些，那就更好了。

约请承担审查的人，学术水平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热心这方面的工作，并有精力和时间来从事这项工作。不然，可能只是虚有其名，并不能真正提高词典的质量。过去约请的人，多是义务性质的，为了更好地落实审查工作，酌致报酬，效果可能会好些。

对全部稿子的审查，要组织内部力量进行。这样做，有保证，而且效果比较好。因为参加编写的人员，职责攸关，业务熟悉，能发现问题，并能提出中肯的处理意见。由于专业知识不足，不能审查的专业条目，可以提出来，组织专业力量审查。

审查，就是专为挑毛病。因此，组织人力时，要挑选善于发现问题的人参加。可能有的人编写工作不突出，但眼光敏锐，很会发现问题。心细手勤的人适于做这项工作。

出版前的审查是重要的，出版后，书到了使用者手里，是更广泛地审查。广大使用词典的人，会帮助找出更多的缺点和错误。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些意见，进一步消灭错误，提高质量。收到的意见，要逐条制成卡片，逐条进行核对，结合内部的检查，进行修改。

一部词典一下子就编写得十全十美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，尤其是部头大一些的词典更难做到。必须经过几次修改，才能逐渐完

善起来。词典出版后，要组织人力进行检查和加工。虽然出版前经过了多次审查、检查，做了技术加工，但漏洞还会是不少的。这是因为词典印出来以前，随时都会有改动，检查、加工过的，仍会出现新的问题。再者，检查、加工时，稿子还在审修过程中，不能都集中起来，常常有检查不到的地方。词典出版后，有了现成的书，翻检容易，便于前后查对。另外，还会有人陆续发现问题，提供线索。这时组织少数热心这方面工作的人进行检查加工，会事半功倍。

七、条目编写和技术加工

一部词典的编写要经过很多人的手，前后矛盾或是照顾不到的地方，在所难免。但一部词典疏漏之处太多了，也会影响词典的质量，给使用的人带来不便。常见的疏漏是有关的条目注释不一致，甚至彼此矛盾。应该互相照应的地方，没有照应。比如，甲条注明见乙条，而乙条根本没有收，或者乙条收了，但没有收与甲条有关的意义，或者没有交代与甲条的关系。甲条用乙条作注，而乙条没收，或者收了，而没有收用做甲条注释的意义。这些情形，都会给查词典的人造成困难，甚至造成误解。这里提到的仅是举个例子，词典里的疏漏和矛盾是多方面的，每项工作中都会存在着。

编写条目时，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，要尽力照顾到有关的方面，不给后来的工作留下麻烦。

《现汉》编写时曾经做过技术加工，由专人负责，分项检查，凡是检查过的条目，都在底稿上加盖图章，注明“已与某条平衡”，或“已与某条核对”。经过检查的条目，如果再要改动，必须连同有关的条目一同改动。检查时，除专科条目外，把语文条目也分成了若干小类，把同类条目摆在一起互相比照，根据其中处理的比较好的来处理。反义词进行对照处理，比如大、小，多、少，长、短等。这样处理的好处是比较一致，无论是意义的分合，还是注释的方式，同样的情形，出入不会太大。没有这样处理的，有的距离就比较大，比如“打、来、搞、闹”等。

后来修改时，技术加工工作做得就很粗疏了，尤其是1975—1977年这次修改，技术加工工作几乎没有做。再加上后来在校样上多次改动，前后很难照顾到，这就使得《现汉》（1978年本）疏漏之处甚多。

技术加工工作常被忽视，有的认为这是细枝末节，不足轻重。其实不然，技术加工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词典的面貌，而且这些问题是查词典的人随时都可碰到的，读者来信中提到的问题，有不少是属于这方面的，应该把这项工作做好。技术加工工作是很繁重的，很琐碎的，不认真对待，是做不好的。

进行技术加工不能怕麻烦，工作越细越好。各项工作都要有专人负责，逐条检查，就是词典中使用的符号也要逐一检查。凡是检查过的项目，都要在底稿上做标志，需要加说明的地方，还应该注明，以便后来查对或别人查看。同时还要规定，技术加工过的底稿，如果再要改动，必须连同有关的条目一齐改动，以防造成新的矛盾。

词典稿子很难做到一字不易，在校样上常常还要修改。这种修改，容易造成前后矛盾。因为看校样是流水作业，看到前头看不到后头，看到后头，前头又交出去了，不能同时比照修改。另外，正式稿子经过了好多道手续，好多人过了目，又做过各方面的查对。在校样上修改是急就章，不可能再经过这么多人过目，再做各方面的查对。因此容易出纰漏，顾此失彼。

在校样上改动是不得已的事情，要尽量少，能不改动的，要尽量不改动。非改动不可的，酌改。凡是改动的地方，都应该做纪录，交技术加工人员重新检查核对，以免出现新的问题。这样才能保证技术加工没有白做。否则，费了很大力气的技术加工工作，很可能收不到预期的效果。比如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“精采”一条，原作“精彩”，1978年本改为“精采”，书中用到的，不少处还是“精彩”，没有能全改过来。

技术加工不是仅就某条检查，而是对全书中有关的条目进行查对。只就一条看，可能看不出问题，把有关条目比照查对就可能

发现问题。比如《现汉》(1978年本)80页,“[播幅] 垄沟中播种作物的宽度。”724页“[垄沟] 垄和垄之间的沟,用来灌溉、排水或施肥。”这两条一比照,就看出问题了。因此,技术加工工作要熟悉业务的心细手勤的人去做。

八、词典编写和科学研究

词典编写和科学研究是密切联系着的,词典要吸收社会上的科学研究成果,反映当时的科学研究水平。科学研究成果越多,词典的质量应该越高。反之,对词典的要求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科学研究水平。当时学术界还没有解决的问题,不可能要求词典全部解决。经过词典编写人员的努力,能解决其中部分问题,就应该说这部词典有了提高。

《现汉》编写初稿时曾设想解决词汇自由运用和不能自由运用的问题,标注词类的问题。由于存在的问题较多,后来没有做。注音联写,勉强做了,无论理论上,还是具体做法上,都存在着很多问题。这些问题,一时还不能完全解决。可以做些试验,不能要求太高。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继续进行研究,力求早日解决,提高词典的质量。

词典编写工作中,有两方面的科研问题。一是词典编写工作本身的科学研究,比如“如何选词”,“如何注音”,“如何释义”,等等。一是词典内容所涉及的科研问题。这方面又可分为两大类。一是跟整个词典编写工作有关系的,如文字学的研究,音韵学的研究,训诂学的研究,词汇学的研究,等等。一是跟个别条目有关系的,如某一事物的研究,某个学科的研究,等等。这些科研工作大量的,不是词典工作者所能全部解决的。我们只能依靠社会上的科研力量,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正确地反映到词典里来。至于这中间的部分问题,我们可能通过研究获得解决,但不能要求太多。

关于词典编写工作本身的科研问题,只能依靠词典工作者自己来解决。因为这些问题,词典工作者理解得比较深,资料比较凑

手,驾轻就熟,容易出成果。而且这样的科研成果是和编写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。它来源于实践,上升为理论,再反过来指导编写工作。没有参加过词典编写工作的人,对这些问题体会不深,研究出的理论,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。再者,局外人做这方面研究的也非常少,看不到有什么研究成果问世。

跟整个词典编写工作有关系的一些问题,也要进行研究,主要是研究把这方面的科研成果怎样运用在词典里。虽然这些方面的问题跟整个词典编写有关系,但也不能把这些科研成果原封不动地搬到词典里。还需要根据词典的要求,有机地吸收进来。

我国很早就有了字典、词典,但对词典编写的研究,历史却很短,我国字典、词典如果说还不算少,但对词典编写的研究却少得可怜。我们能把词典编写中的问题摆成堆,但有成效的解决办法却不多。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词典水平不高的症结所在。为了尽快解决这种状况,应该大力开展词典编写的研究工作。

在机械化的今天,我们编写词典还完全是手工业方式,这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。我们应该有计划地、有步骤地开展利用电子计算机收集资料和编写词典的研究,以期能早日实现利用电子计算机收集资料和编写词典。

《辞书研究》的出版,给我们的词典工作研究创造了条件,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个阵地,发表研究成果,开展学术讨论,交流工作经验,介绍编写情况。千方百计,进一步促进词典工作的科学研究。

开展词典工作的科学研究,目前困难尚多。首先,我们这支队伍就又小又弱,应付当前的工作都有困难,那里能匀出时间来进行科学研究。更何况词典工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的研究,并不是轻而易举的,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。《现汉》编写过程中,曾几次布置进行总结,对一些问题进行探讨,但结果都落了空,基本上没出成果。提出这些困难,希望引起各词典编写单位的重视,逐步创造条件,开展研究工作,以期多出些成果,提高词典的水平。